



三国史鉴

——以帝王为中心

潘民中 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三 国 史 鉴

——以 帝 王 为 中 心

潘民中 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 郑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国史鉴：以帝王为中心/潘民中著. —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3. 4

ISBN 978-7-5649-1181-2

I . ①三… II . ①潘… III . ①帝王 - 人物研究 - 三国时代

IV . ①K827 = 3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79952 号



责任编辑 朱春华

责任校对 朱春华 余建国

封面设计 王四朋

出版发行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中华大厦 2401 号 邮编：450046

电话：0371-86059712（高等教育出版分社）

0371-86059713

0371-86059721（营销部） 网址：www.hupress.com

排 版 郑州市今日文教印制有限公司

印 刷 郑州市今日文教印制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2.25

字 数 226 千字 定 价 2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序

孟 聚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但以文言写就的古代史书，已无法引起现代读者的心灵共鸣。因为语言的障碍，古籍思想智慧的光芒，黯然失色。快速的生活工作节奏，也使人们失去了判读古籍的心境、氛围和学养。即使悉心向学，也终难拂去文言、文意之阴翳。因此，由学问渊博、思想深邃的专家学者深入浅出，写出既不失古人古意又能为今人理解接受的著作，引导帮助今天的读者去感悟古籍的真谛，借鉴古往，以昭后来。这既是专家学者的社会责任，也是专家学者的传统自觉。

正是秉承着这样的责任和自觉，十年磨一剑，终可试锋芒。潘民中老师的《三国史鉴》将要出版发行了（下称《史鉴》）。这对于一位几十年如一日，自甘寂寞，矢志不渝，孜孜以求的学问人而言，如同卸下了一副重担，了却了一桩心事，对学术文化是一个奉献，对同道知己是一个交待，这实在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情。可潘老师邀我为书作序，却让我踌躇彷徨。

以潘老师的学术建树及社会影响，约请学术界哪位大家名流为本书写序绝不是困难的事情，而作为一部倾注几十年心血而成就的学术专著，请一位德高望重的专家作一序言，予以推介，自在情理之中。而以我个人之肤浅才学更不必说社会声望，担当如此之重托，的确是诚惶诚恐的。怎奈潘老师不慕时尚，远避世俗。其实我这种虚荣的瞻前顾后也是多余的：《史鉴》绝不会因为我的些许言语而“洛阳纸贵”；同样，作者的学术地位、社会名望，也不会因为我的一段文字而受到丝毫的影响。盛情难却犹豫徘徊之际，忽然忆起，我做学术期刊编辑有一心得：“名刊物让作者因刊而名，大作者让小刊物因人而大。”我自然属于前者。我权当是编辑读过名作名著之后写篇“读后感”。读后感文无定式，率意而为，有感而发，偏颇亦无大碍。想到此，心中坦然了许多。

魏、蜀、吴三国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波澜壮阔，风云诡谲，可歌可泣，可资

可鉴，是中国历史的瑰丽史诗，古代王朝兴衰的袖珍标本。若说三国史研究，有史以来，皇皇巨著、灿烂华章，可谓汗牛充栋。远且不论，仅述当代，20世纪90年代就有马植杰先生、何兹全先生的两部《三国史》，作为有重大影响之作，早已沾溉学界，嘉惠士林。近年来出现了“辨”、“品”、“实话”，“细说”等，加上不少的三国游戏作品，更让人目不暇接，这对活跃史坛，繁荣文化，普及大众，推动三国史的学术研究，委实功莫大焉。但另一方面确也难免浮气、躁气或油气之嫌。还有匪夷所思者，所谓的研究，能从《三国志》的作者陈寿骂起，一路骂来，裴松之、习凿齿、《后汉书》《续后汉书》的作者，直至罗贯中，都在挨骂之列。学术在骂声中发展，社会在牢骚中进步，似乎也是规律。但凭一己之力，逮着谁骂谁，好像凡与三国史研究沾边的人，都要骂个遍，作者是否心有余而力不足，姑且不论，但有一点是很容易让大家联想到两种人的：一是为哗众取宠而不惜自制绯闻的“明星”；二是签名售书效果不佳跑到北京裸奔促销的作者。

而读罢《史鉴》，第一感觉是持论公允，观点平实。既然是史鉴，首先是作者的鉴别、明鉴，然后是让读者以史为鉴，借鉴、鉴戒。它不仅是一己之见，一家之言的自鉴、我鉴，还要鉴示他人、昭示社会。通读全书，《史鉴》没有那种所谓“高屋建瓴，雄视天下”的激愤惊人之语，也没有顾此失彼，抓一点不及其余的偏颇之词。作者始终坚持论从史出，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史学原则。潘老师一以贯之的扎实、朴实、平实、严谨、简明的文风，成为《史鉴》的一大特色。

如对魏文帝“无旷达之大度”，“乏治国之长略”；魏明帝“任人唯亲”，“托孤非人”；孙权晚年“病夫治国”，“失误百出”；刘备的“急于求成”，“刚愎自用”等评鉴均为实在中肯足为后世警戒之论。

特别是对三国末帝的鉴论，尤显作者穷究史实、求是求真的治学态度。各国末帝，皆为亡国之君，无论当时还是后世的评价，多为蔑视、诟病之语。而《史鉴》并未停留在就事论事浅尝辄止的层面上。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对人物给出了恰当公允的评论。如蜀后主刘禅，“乐不思蜀”四个字，把他永远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阿斗”之名，也成了千百年来“白痴”、“无能”的代名词。《史鉴》没有人云亦云，而是从刘禅早年丧母，其父又一直在戎马倥偬之中，得不到家庭的温暖和教育，待到刘备晚年，想悉心调教，可为时已晚。这样合情合理的笔触，不仅让读者看到了另一侧面、另一语境下的的刘禅，而且就少儿教育与成才的关系，也给世人以警示和借鉴。

在体例上，《三国史鉴》继承了我国古代编年体、国别体、纪传体的优良传统，但又不固成规，而是别出心裁，自成机杼。《史鉴》以魏、蜀、吴三国的十一位帝王

为中心,对每位帝王在位期间的基本情况有一个基本勾勒,然后在其名下编排具有代表意义的军国大事,最后,对该帝王有一个总体评价。时经事纬、层次明了、重点突出,虽用笔简约,却不失历史场面的宏阔;是著线索清晰,无论人物还是史实,看似独立,实有关联,既彰显了不同历史时期的时代风云,又使我们看到每一国别历史发展的内在联系,与此同时也揭示了三国之间的微妙关系。

《史鉴》的第一部分,作者从魏国开国皇帝曹丕写起,恰如其分,自有道理。但系统地研究三国史,又是无法回避魏武帝曹操的。在此,作者将对魏武帝的品鉴,独立成章,《史鉴》的第二部分为 76 条 30000 余言的《读〈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札记》排列在三国诸帝之后,不仅避开了逻辑上三国史分期的争议,又巧妙地弥补了《史鉴》不写曹操的缺憾。而且该部分详备的笔墨又是对第一部分的细化和深化,使之更加丰富和充实。由此,我们不难看出,作者在体例安排上的匠心独运。30000 余言的读书札记,决非一朝一夕之功可为之,而是作者长期披览深思积累积淀的结晶,足显作者在学术研究上的功用之勤,功力之深。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札记第 76 条,关于曹操的军事活动,作者就曹操 30 年间的 58 次战役,从时间、战场、敌我与将领、战事结果诸多方面,一一梳理爬抉,分门别类,详做统计,从战争实践的角度,进一步印证、活化了曹操军事家的丰满形象。作者治学的严谨扎实,于此可见一斑。

谈读后的感受,不能不说《史鉴》的第三部:《绿云楼购藏三国史著目录(111 种)》。“绿云楼”是作者书斋的雅号,其六世祖晚清进士敬亭先生自福建卸任归里,于苍翠林莽间筑室耕读。引得河南巡抚慕名造访,为其书斋题匾“绿云多处”,潘老师书斋“绿云楼”源出于此。意在眷念家乡既往原生态的人与自然之和谐及先祖之德泽。

购藏 111 种三国史学术专著,是一个什么概念?不读《史鉴》,仅从这一百余种三国史专著中,我们就不难猜想《史鉴》有多么宽博的学术背景和厚重的学术分量,更不难想象《史鉴》是建立在怎样坚实的基础之上的一座金字塔。

藏书宏幅自然是昭示文人价值、传播人类文明的善举,购书藏书而勤苦读书且富有成就者,更是展现文人内涵值得世人钦敬的美德。作者购藏的这一百余种三国史专著不是摆设,不是装潢,而都是作者一一研读下过苦功的。因为,这个书目不同于一般意义的参考文献的罗列。这不仅是对著者、书名、出版社、出版年的简单记录,而且还有作者购书的方式、途径、地点、评论及对版本源流的考辨。有些评介,本身就是一篇富有新意的学术短文,还有一些购书雅趣感事怀人的篇什,读来如身临其境,历历在目;又似咀嚼甘饴,回味无穷。

作为一名 20 世纪 80 年代中等学校教师起家的文史工作者，购藏书籍仅三国史这一专业领域就多达一百多种，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人生追求、什么样的精神境界？读到作者在得到全套《资治通鉴》后喜不自禁的一段心灵独白：“1984 年在襄城师范任教月薪只有 53 元时，下决心花 30 元从襄城新华书店购得全二十册《资治通鉴》，当捧着这整整齐齐一摞新书回到居室，心里的兴奋是无法言表的，从此我有了一部属于我自己的《资治通鉴》。”就不难找出答案，当时他 53 元的工资还养着妻儿老小三代人！学问人嗜书如命对文化事业的一往情深，令人唏嘘感喟！

文如其人，作者对这些学术著作的评价实事求是，那怕是名流大家，也不曲意，不奉迎，不隐不讳，坦荡直言。

缘分造化，我与作者交往已近三十年矣。三十年乃近人生之半！潘老师年长于我，因为学问的影响，他还担任市厅级的领导职务。而我们之间不称先生，不称兄弟，我更没有称他过“主席”、“领导”，而一直互称“老师”，且习以为常，至今不曾改口。我们自以为这是当下读书人的心灵之间的一种默契，一种共识，一种心照不宣。这是对文化的挚爱，是对人格的尊崇；是对精神家园的向往；是对传统文化的守望……

知往鉴来，民族需要精神支撑，社会需要文化维系。否则，即使我们的教育投资超过了国内生产总值的 4%，也不能说我们的教育就成功了；即使我们的经济翻了两番，也不能说我们就真正建成了小康社会。这该是《三国史鉴》及许多学术文化专著出版发行的立意与归宿吧。

琐言絮语，聊充小序。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于西塘樵人屋

目 录

序	(1)
第一章 魏 国	(1)
第一节 文帝曹丕	(2)
第二节 明帝曹叡	(17)
第三节 齐王曹芳	(35)
第四节 高贵乡公曹髦	(43)
第五节 元帝曹奂	(50)
第二章 蜀 国	(55)
第一节 昭烈帝刘备	(55)
第二节 后主刘禅	(64)
第三章 吴 国	(73)
第一节 大帝孙权	(73)
第二节 会稽王孙亮	(87)
第三节 景帝孙休	(92)
第四节 末帝孙皓	(102)
读《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札记	(115)
附 录	(146)
绿云楼购藏三国史著目录(111 种)	(146)
后 记	(186)

第一章 魏 国

魏国的建立者是曹丕，开创其基业的是曹操。曹操在关东（函谷关以东）州郡联合反对董卓的斗争中崭露头角，在镇压黄巾起义武装余部和牧守混战中壮大力量，然后抓住时机取得“挟天子以令诸侯”^①的政治优势，南征北战，东征西伐，最终统一北方。建安九年（公元 204 年）曹操占领邺城（今河北临漳西南邺镇），领冀州（今河北中南部）牧，从此常住于邺。邺城既是冀州的首府，又是冀州首郡魏郡的治所。建安十八年（公元 213 年）汉献帝以魏郡及其周围九郡凡十郡封曹操为魏公，加九锡，以丞相领冀州牧如故。魏建立起社稷宗庙，设置尚书、侍中、六卿，草创朝政制度。建安二十一年（公元 216 年）曹操进爵魏王。次年获得享用皇帝仪仗的资格，并立曹丕为魏太子。建安二十五年（公元 220 年）正月曹操病逝于洛阳（今属河南），曹丕嗣位为魏王，以魏代汉，定都洛阳，正式建立魏国朝廷。魏国版图包括今淮河南岸一部分及以北广大中原地区和秦岭以北关中、陇右、河西地区，西至新疆，东抵朝鲜半岛西北部。共有司（辖区相当于今晋南和豫西北）、冀、并（辖区相当于今山西中东部）、幽（辖区相当于今京津、辽东及朝鲜）、凉（辖区相当于今甘肃中西部）、雍（辖区相当于今陕西中部及甘肃东南部）、荆（辖区相当于豫西南和鄂西北）、兗（辖区相当于今山东西部、治所麤丘在今山东鄄城东北）、豫（辖区相当于今河南中东部）、扬（辖区相当于今豫东南及安徽中部）、青（辖区相当于今山东东北部）、徐（辖区相当于今苏北和鲁东南）十二州及西域长史府（辖区相当于新疆南部和东部），九十三郡国，七百二十一县，户六十六万三千四百二十三，口四百四十三万二千八百六十一。咸熙二年（公元 265 年）司马炎代魏称帝，建立晋朝，魏国灭亡。魏国共传五帝，历四十六年。魏在三国中立国最早，版图最大，人口最多，实力最强。但因文帝曹丕无旷达之度，乏长治之略；明帝曹叡大兴土木，空耗

^① 陈寿《三国志》（中华书局 1982 年 7 月第 2 版，下同）卷六《袁绍传》裴松之注引《献帝传》（P195）。

国力，任人唯亲，托孤非人，造成皇室衰微，强臣掌执国命的政治格局，仅四十余年就被禅位易代。曹操创业之伟烈，曹丕、曹叡经国之不善，司马氏崛起之迅速，堪为史鉴者甚多。

第一节 文帝曹丕

魏文帝曹丕(公元187—226年)，公元220—226年在位。东汉献帝刘协建安年间(公元196—220年)丞相、魏王曹操的次子。灵帝中平四年(公元187年)生于沛国谯郡(今安徽亳州)曹氏老宅。生母卞氏，出身倡家，本为曹操媵妾，因常随侍左右，建安初年升为继室。曹丕八岁开始读书习射，十岁与庶兄曹昂跟着曹操征讨张绣，曹昂不幸阵亡，曹丕成为曹操事实上的长子。建安九年(公元204年)曹操为曹丕纳袁绍子媳甄氏为妻。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曹丕被任以五官中郎将、副丞相，成为父亲曹操的佐贰。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曹操称魏公以后，曾欲立曹丕同母弟曹植为嗣。曹植有超群之才，能文能武，甚得曹操宠爱。曹丕遂展开与曹植争夺嗣位的角逐。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年)曹操进爵魏王，次年立曹丕为王太子。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曹操卒，曹丕继位为汉丞相、魏王，改建安二十五年为延康元年。延康元年十月十三日，汉献帝遣使持节奉玺绶、诏册，禅位于魏。二十九日曹丕在繁阳(今河南临颍繁城镇)设置受禅坛，举行受禅大典，接受皇帝玺绶，即大魏皇帝位。宣布大赦，改元黄初，以当年为黄初元年。曹丕在位七年，黄初七年(公元226年)五月十七日崩逝，享年40岁，谥号文皇帝。

繁阳受禅

延康元年(公元220年)十月二十九日，魏王曹丕在许都南郊繁阳亭(今河南临颍繁城镇)受禅坛上举行仪式，接受汉献帝禅让，即大魏皇帝位。中国历史上三国时代的魏王朝正式开张。

繁阳受禅，实现了曹操、曹丕父子两代人不懈追求的政治夙愿。自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曹操迎汉献帝刘协都许(今河南许昌东)“挟天子以令诸侯”起，东汉王朝是在曹操手中得以延续的。随着北方的统一和南进的受阻，曹操把注意力转向了内部，加快取汉而代之的步伐。其爵位由武平侯而魏公，而魏王。其享有的特权由“赞

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①；而建社稷宗庙、自置尚书、侍中、六卿等中枢机构，位在诸侯王上；而“设天子旌旗，出警入跸”，“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车，驾六马，备五时副车”^②。到建安末年，无论从手中握有的实权，还是从所享受的礼制规格来看，曹操都俨然是一位皇帝了。但由于长期以来朝廷内部拥刘抑曹派的抗争和外部刘备、孙权两大军事政治集团的制约，曹操没能迈出取汉而代之这最后一步，而以“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③自慰，把取汉而代之的大任留给了嗣子曹丕。

建安二十五年（公元 220 年）正月二十三日，一代雄杰曹操病逝。曹丕嗣位汉丞相、魏王，加快代汉事宜的运作。首先改元延康，借以标志自己统治的开始。接着提升亲信大中大夫贾诩为太尉，御史大夫华歆为相国，大理王朗为御史大夫，并设置散骑常侍、侍郎各四人，建立起以自己为核心的中枢班子，把大权牢牢的掌握在自己手中。继之兴兵南征孙权以树立自己的权威。延康元年（公元 220 年）六月七日，曹丕在魏都邺城（今河北临漳西南邺镇）东郊检阅军队，誓师征吴，二十六日出兵南下。进入七月，孙权派遣使者向曹丕奉献珍宝奇物，求和结好。曹丕不战而胜。蜀汉驻守上庸（今湖北竹山西南田家坝）的将军孟达率众投降。武都（今甘肃西和西南）氐王杨仆也请求归附。曹丕威名大扬。七月二十日曹丕在故乡谯郡（今安徽亳州）大飨六军，祭祀祖陵，宴请父老乡亲。八月，令亲信丞相祭酒贾逵任豫州刺史。群属一致上表曹丕，劝其顺天人之望代汉而立。十月初曹丕径率南征大军自谯郡西赴许都，四日到达颍阴曲蠡（今河南许昌南）。十三日汉献帝非常知趣的派御史大夫张音持节奉玺绶、诏册，禅位于魏。曹丕命人在曲蠡繁阳亭筑坛，举行受禅大典。二十九日曹丕登坛受禅，即大魏皇帝位。公卿、列侯、诸将、匈奴单于、四夷朝献使节数万人参加了这场受禅大典。曹丕宣布大赦、改元，以当年为魏黄初元年。

繁阳受禅是曹丕精心策划的一个胁迫汉献帝交出皇位的政治仪式。这个仪式从表面看是在和平的气氛中进行的，究其实却蕴藏着杀机。曹丕借南征回师之名以大军临许都城下，授意许都城内亲曹派文武官员向汉献帝称说天命，威逼汉献帝从速禅位。汉献帝身处外有大军内有强臣的窘境，只得忍辱服从。所以繁阳受禅是在亦武亦文文武交攻的形势下实现的。汉献帝被迫同意禅位后，曹丕又假意谦让一番，然后举行了禅让大典。这场禅让大典是作给世人看的，以此证明大魏皇位

① 《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P36)。

② 《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P49)。

③ 《三国志》(第五三页)卷一《魏书·武帝纪》裴注引《魏氏春秋》(P53)。

取之有道。曹操、曹丕父子创造的这种以和平手段实现改朝换代的方式为司马昭、司马炎父子所效法，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权更迭的主要模式。

定都洛阳

黄初元年(公元220年)十月，曹丕代汉而立。十二月营建洛阳宫，定都洛阳。洛阳是东汉朝廷经营一百六十多年的都城。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董卓之乱，洛阳宫室遭焚，城内扫地殆尽，城外二百里无复人烟，百年故都成了一片废墟。此后一段时期洛阳残垣断壁，荆棘丛生，兔狐出没，以至于汉献帝从关中逃回时，并无片瓦支椽可供立足。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曹操迎汉献帝都许后，洛阳虽仍称故都，但二十年间状况并没有多大改变。建安九年(公元204年)曹操消灭袁绍势力，占领河北，行冀州牧，遂以邺城为首府。以后曹操称魏公、魏王即以邺城为魏都。曹丕以魏代汉，建立魏王朝，以何地作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许都尽管作了四分之一世纪的汉都，那只是当年曹操为“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权宜之计。说实在话，许昌为四战之地，不具备做魏王朝永久性国都的形胜。邺城虽为魏朝王业的奠基之所，但偏居大河以北，作魏王朝的首都也不合适。在曹操、曹丕父子看来，魏王朝是承继东汉王朝正统的王朝，它应当因汉之旧，复都洛阳。

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曹操从进击刘备的汉中(今属陕西)前线还军，不回邺城，而驻足洛阳，并兴工重建了他早年任洛阳北部尉时的官廨，同时修筑建始殿于原洛阳北宫故址之上。向世人透露了要恢复洛阳作为全国政治中心的信息。这一年，阻击关羽北上的樊城(今属湖北)战役取得胜利，强撑病躯的曹操从行营摩陂(今河南郏县东)既不入许都也不返邺都，而折还洛阳，最终卒于洛阳。这等于是给曹丕留下了以洛阳为都的政治遗嘱，所以曹丕一登基即着手营建洛阳宫，并于黄初元年(公元220年)十二月十七日移驾洛阳，以曹操修筑的建始殿朝群臣，诏徙冀州士家十万户充实洛阳。次年，魏朝廷明令实行五都制，以洛阳为首都，以东汉西都长安(今陕西西安)、曹魏帝乡谯郡(郡治谯在今安徽亳州)、献帝旧都许昌(今河南许昌东)和曹魏故都邺城为陪都，以西界宜阳(今河南宜阳)、北循太行、东北界阳平(今河北馆陶)、南循鲁阳(今河南鲁山)、东界鄒(今山东邹州)为洛阳的畿辅之区。从此开始了以洛阳为政治中心的魏王朝历四十六年的统治。

洛阳位居黄河中游南岸的伊洛盆地。这里背依太行，面瞰嵩岳；右有崤函之固，左有成皋之险，中有伊、洛二水东流；又可通过黄河舟楫北与冀州，东与青、徐，南与扬州沟通。洛阳周围土地肥沃，自然条件优越，为夏、商、周三代之旧居，刘邦曾欲立都于此，刘秀以之为都长治久安近二百年，是一处比较理想的都城选址。大

魏奠都洛阳，统治北方，成为鼎足三国中实力最强盛的国家，为西晋统一天下奠定了基础。

贬 抑 群 弟

曹操在世时，曹丕经过与弟弟曹植明争暗斗得以被立为魏王太子。曹操卒后，曹丕的另一位弟弟曹彰从长安奔丧洛阳，问先王玺绶所在，大有干预王位继承之意。因此，曹丕自继位丞相、魏王直至去世，始终贯彻一条贬抑群弟的政治战略。

曹丕原有嫡庶弟兄二十四个，待他继位之后，在世的尚有十一位。在这十一个弟兄中对他嗣位构成威胁的是两位同母弟弟曹植和曹彰。延康元年（公元220年）二月二十一日安葬曹操之后，曹丕即令诸弟迅速离开邺都奔赴各自的封地，不得迟延，并分派监国谒者随行监视他们的言行。黄初元年（公元220年）十月曹丕代汉称帝，次年临淄（今属山东）侯曹植的监国谒者灌均诬奏曹植“醉酒悖慢，劫胁使者”^①。曹丕大怒，下令将曹植逮至京师，严加治罪。因其母亲卞太后干预，才予以从宽处理。诛杀曹植的亲信丁仪兄弟，贬曹植为安乡（今河北无极东南）侯。七月将诸弟由侯爵晋位公爵，却只给曹植由安乡侯改封为鄄城（今山东鄄城北）侯的待遇。

黄初三年（公元222年）三月，曹丕为了把自己的儿子曹叡、曹霖直接封王，不得不把诸弟都晋爵为王，而鄄城侯曹植到四月才被封为鄄城王。曹丕虽将诸弟进爵为王，却都是寄地定名，而无其实，每个王国只准拥有百余名老兵以备守卫，不经许可不得进京朝聘，还设防辅监国之官伺察其言行。这些被晋爵为王的诸弟，虽有诸侯王之号，而与匹夫没有多大差别，甚至连求做布衣的自由都没有。曹丕惩治诸侯王的科条非常严峻，要求防辅监国之官每天都要把诸侯王的言行过失随时上报。各诸侯王无不在战战兢兢中度日如年。即便如此，曹丕仍不肯轻易罢休。宛城（今河南南阳）太守杨俊仅仅赞扬了鄄城王曹植几句，就遭到曹丕的杀戮。东郡（治所在今河南濮阳南）太守王机、防辅吏全辑乘机诬告曹植，曹植再次被缉拿到洛阳问罪。黄初四年（公元223年）五月，曹植与白马王曹彪、任城（治所任城在今山东微山县西北）王曹彰来京师朝聘，曹丕拒不接见，并蓄意诛杀曹植、曹彰。后因卞太后强力干预，曹植虽免于一死，任城王曹彰却没能躲过这一劫，不明不白的死于洛阳。曹彰在曹丕诸弟中贯以勇武著称，其刚严威猛，深谙兵法。曹操临终召

^① 《三国志》卷十九《魏书·曹植传》（P561）。

曹彰赴洛阳，曹彰未到而曹操已死。曹彰对曹植说：“先王召我者，欲立汝也。”^①因之有问玺绶之举。曹丕对曹彰心存疑忌。曹彰死，曹植被整治得恭驯异常。黄初五年（公元224年）曹丕下诏：“先王建国，随时而制。汉祖增秦所置郡，至光武以天下损耗，并省郡县。以今比之，益不及焉。其改封诸王，皆为县王。”^②如此这般，就把诸弟由郡王改为县王，其封地当然也由一郡缩小为一县。

曹丕贬抑群弟，实行强干弱枝之策，把诸弟手中的实力限制在仅供其苟延生命的程度，以防尾大不掉强藩威胁朝廷的情形出现。这个目的确实达到了。曹魏政权自始至终没有像西汉那样形成宗藩强盛欺凌中央的局面，但却造成了枝不护干皇室孤立无援的弊端。日后强臣司马懿父子之所以能够轻易篡夺曹魏大权，这当是其主要原因。

禁妇人与政

作为紧承东汉王朝而建立的魏朝，东汉王朝的“殷鉴不远”。魏朝的开国之君曹丕非常重视吸取东汉王朝因母后临朝、外戚专权、宦官乱政招致衰亡的教训，力避其悲剧重演，以期大魏王朝国祚永传。

曹丕早在继位汉丞相、魏王的延康元年（公元220年）二月就下令：“宦人为官者不得过诸署令，为金策著令，藏之石室。”^③禁止宦官干政。因有此令，魏朝始终没有发生宦官乱政之事。这与蜀汉刘禅宠用宦官黄皓形成鲜明的对比。曹丕代汉称帝以后，又于黄初三年（公元222年）九月三日下诏：“夫妇人与政，乱之本也。自今以后，群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当辅政之任，又不得横受茅土之爵。以此诏传后世，若有背违，天下共诛之。”^④此诏言辞极为严厉。说是为杜绝母后与政、外戚擅权而发，但也事出有因。曹丕称帝，尊生母卞氏为皇太后。曹丕、曹植、曹彰均为卞氏所生。卞氏喜欢曹植。曹操一度欲立曹植为嗣，虽说是欣赏曹植之才，也不能说没有卞氏的影响在其中。曹丕被曹操立为魏王太子时，左右侍从向卞氏祝贺，劝卞氏倾其所藏赏赐曹丕。卞氏态度冷淡地说：“王自以丕年大故用为

^① 《三国志》卷十九《魏书·曹彰传》裴注引《魏略》（P557）。

^② 《魏文帝集》（岳麓书社1992年10月版《三曹集》，下同）卷一《改封诸王为县王诏》（P132）。

^③ 《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6月版，下同）卷六十九《魏纪·文帝黄初元年》（P2178）。

^④ 《三国志》卷二《魏书·文帝纪》（P80）。

嗣，我但当以免无教导之过为幸耳，亦何为当重赐遗乎？”^①曹操死后，卞氏对曹丕贬抑曹植、曹彰不满。黄初二年（公元221年）监国谒者灌均诬奏曹植“醉酒悖慢，劫胁使者”，曹丕要严加治罪。由于卞太后的干预，曹丕才不得不把曹植从轻发落，贬为安乡侯。在这种情势下，曹植、曹彰公开或暗地向母亲卞氏诉苦，寻求卞氏的庇护是很自然的事，倾向于曹植和曹彰的朝臣也时不时地奏事卞太后。另外，在曹操生前，卞氏就曾因曹操不重用不重赏其弟卞秉有过怨言。曹丕即位后，卞氏又暗示曹丕追封其父母，后因尚书陈群从中阻止，方才作罢。曹丕担心卞氏长此干预政事，会影响到他皇位的稳固，于是就下了“禁绝妇人与政”诏。因有此诏，终魏一代没有发生妇人与政、外戚擅权弊象。这与吴国公主鲁班主谋废立，外戚贵盛参与嫡庶之争，对比鲜明。

曹丕禁止妇人、宦官、外戚干预朝政，是借鉴东汉朝廷弊政而采取的重大政治举措，是具有长远政治眼光的政治策略，对稳固自身及其嗣君的皇位产生了重要作用。历代王朝像曹丕这样把妇人、宦官、外戚干政的痼疾解决得如此彻底，是不多见的。

重用司马懿

最终倾覆魏王朝的司马氏集团，其势力崛起于曹丕对司马懿的重用。

从建安六年（公元201年）曹操初识司马懿，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辟为丞相文学掾，直到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曹操病逝之前，对司马懿的任用都是很有限度的。司马懿官不过五品，职不过太子中庶子、军司马。曹丕继位丞相、魏王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随着曹丕对司马懿的重用，司马懿的官品直线上升，所任职务也越来越重要。延康元年（公元220年）曹丕把司马懿转为丞相长史、御史中丞。御史中丞已是正四品高级官员。曹丕代汉称帝，于黄初二年（公元221年）提升司马懿为侍中、尚书右仆射。尚书右仆射是三品中枢要员。黄初三年（公元222年）曹丕第一次南征孙吴，司马懿是作为众多侍从中的一员随之宛城（今河南南阳）的。黄初五年（公元224年）再征孙吴时，曹丕就将坐阵许昌掌后方留守事务的重任委于司马懿。到黄初六年（公元225年）三征孙吴，曹丕授予司马懿以抚军大将军之职。抚军大将军官居二品，不仅拥有一支归自己指挥的军队，而且具有自行设置长史、司马、主簿、诸曹等属官的权力。虽然仍令司马懿留镇许昌，但已明

^① 《三国志》卷五《魏书·后妃传》（P156）。

确为“督后诸军，录后台文书”^①。就是说交给了司马懿掌管后方一切军政事务的全权。曹丕还诏命司马懿：“吾深以后事为念，故以委卿。吾东，抚军当总西事；吾西，抚军当总东事。”^②表示了对司马懿的极大信任。曹丕对司马懿的信任和重用更表现在黄初七年（公元226年）五月临终安排辅政人选上。曹丕把司马懿列入辅政大臣之一，受遗诏辅佐嗣主。曹丕所指定的辅政大臣有四人，除司马懿外，另三人是中军大将军曹真、镇军大将军陈群、征东大将军曹休。在这四人中，曹真、曹休出身皇室宗亲，早年追随曹操南征北战，屡立战功。曹丕继位前，他们已官至三品。陈群、司马懿则是曹丕为太子时所信重的属员，与吴质、朱铄号称“太子四友”，即位后以二人为亲信迅速提拔起来。曹丕遗诏以司马懿为辅政大臣，意味着司马懿进入了魏朝廷的最高决策层。

曹丕对司马懿信任而不提防，重用而无节制，使司马懿父子得以在魏朝廷中顺利发育成一股举足轻重的政治势力，最终形成一个足以取魏朝廷而代之的政治军事集团。是曹丕本人为后世子孙“养育”了一个无法排除的大患。同时从曹丕生前重用司马懿，临终又安排其进入辅政班子，还可以看出曹丕已改曹操“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而为“任人唯亲”。应该说这也是魏王朝很快走上衰亡的原因。

屈杀鲍勋

黄初七年（公元226年）正月，曹丕派人到廷尉监狱直接杀掉远远够不上死罪的治书执法鲍勋，亲手制造了一起冤案。

鲍勋之父鲍信初平三年（公元192年）亲迎曹操领兗州牧，并在寿张（今在山东东平县西南）与青州黄巾军作战中为救曹操而英勇献身。建安十七年（公元212年）曹操追念鲍信救驾之功，特意征召鲍勋为丞相掾。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曹操立曹丕为魏王太子，令鲍勋到曹丕身边任太子中庶子。鲍勋遇事守正不挠，为曹丕所不喜，遂离开东宫出任魏郡西部都尉。当时曹丕所宠幸的郭夫人有一个弟弟在曲周县（在今河北平乡南）为吏。曲周县属魏郡西部都尉管辖。郭夫人弟盗窃官布，按法律应处弃市之刑。曹丕几次写信给鲍勋，要求放人。鲍勋不敢擅作主张，就把整个案情如实上报，因此得罪了曹丕。曹丕受禅称帝，贪图虚荣把营建宫室修筑台榭苑囿放在第一位。时任驸马都尉兼侍中的鲍勋秉公直谏：“今之

^① 《三国志》卷二《魏书·文帝纪》裴注引《魏略》（P85）。

^② 《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11月版）卷一《宣帝纪》（P4）。

所急，唯在军农，宽惠百姓。台榭苑囿，宜以为后。”^①曹丕在为父亲曹操服孝期间肆意游猎，鲍勋拦车上疏据理谏阻，曹丕当众撕毁其奏章照旧行猎不止，猎罢即将鲍勋调离宫省。

黄初四年（公元 223 年），原来与鲍勋同任太子中庶子，现已居尚书令、尚书仆射高位的陈群、司马懿，共同举荐鲍勋为御史中丞，曹丕很不情愿地采纳了二人的意见。御史中丞负责督察百官之职。自从鲍勋出任御史中丞之后，百官严惮，无不肃然。黄初六年（公元 225 年）三月，曹丕欲三征孙吴，让群臣发表意见，鲍勋说：“王师屡征而未有所克者，盖以吴、蜀唇齿相依，凭阻山水，有难拔之势故也。往年龙舟飘荡，隔在南岸，圣躬蹈危，臣下破胆。此时，宗庙几至倾覆，为百世之戒。今又劳兵袭远，日费千金，中国虚耗，令黠虏玩威，臣窃以为不可。”^②曹丕认为鲍勋揭了他上次征吴招致残败之短，怒而把鲍勋降职为治书执法。曹丕征吴失败而归，停军陈留（在今河南开封东南），刚划定营垒区域，插上标识，尚未筑成。太守孙邕抄近道越标识拜会鲍勋，军营令史刘曜要治孙邕擅闯营垒之罪。鲍勋以堑垒未成，不为擅闯，将孙邕释放。正想寻机惩治鲍勋的曹丕听说此事，立即下诏：“勋指鹿作马，收付廷尉。”廷尉高柔按法议罪，定为“正刑五岁”^③。廷尉正、廷尉监、廷尉平三官复核认为量刑过重，按律只应罚金二斤。曹丕怒不可遏地传旨：“勋无活分，尔等欲纵之！收三官以下付刺奸，当令十鼠同穴。”^④太尉钟繇、司徒华歆、镇军大将军陈群、侍中辛毗、廷尉高柔、侍中卫臻联名上书，为鲍勋求情。曹丕一概不准。廷尉高柔坚决不接受处死鲍勋的诏命，曹丕就把高柔召到尚书台，然后派人到廷尉监狱直接诛杀了鲍勋。法不当杀而强行杀之，曹丕对直臣鲍勋的残暴施刑达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

曹丕屈杀直臣鲍勋，与其对诸弟的刻薄寡恩一样，反映了他被权力扭曲了的性格中残忍性一面。鲍勋数忤曹丕之意均出于公心，而竟积怨于曹丕。曹丕乏人君之雅量昭然若揭。从鲍勋事件可以看出曹丕厌恶刚正不阿的直臣而喜欢曲意逢迎的佞臣。陈寿指责曹丕无“旷大之度”、“公平之诚”^⑤是客观的，而对鲍勋“秉正无亏，而不免其身”^⑥则表示极端痛惜。

① 《三国志》卷十二《魏书·鲍勋传》(P385)。

② 《三国志》卷十二《魏书·鲍勋传》(P385)。

③ 《三国志》卷十二《魏书·鲍勋传》(P386)。

④ 《三国志》卷二《魏书·文帝纪》(P89)。

⑤ 《三国志》卷十二《魏书·鲍勋传》(P390)。

⑥ 《三国志》卷十二《魏书·鲍勋传》(P390)。